

内、外相应：刘向父子校书与“新王官学”的建构

耿战超*

<目 录>

1. 序言
2. 《七略》归于治道的价值追求
3. 影响新王官学建构的时代动因
4. 刘氏父子校书与新王官学术体系的定型

1. 序言

河平三年(前26年)，刘向奉成帝诏典校内府藏书，并总领其事，其卒后由子刘歆继业，最终在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总成《七略》，完成了对于汉代中秘藏书的一次总校理。刘氏父子的这番工作，意义非凡，汉人当时即多有评述。班固称道曰：“《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¹⁾“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²⁾荀悦亦曰：“至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新义分方，九流区别，典籍益彰矣。”³⁾刘氏父子之首功，就在于理清了汉世文献良莠掺杂的乱象，编订《七略》总理百家文献之端绪，以定天下之疑。

东汉王充亦有赞语曰：“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政道焉。”⁴⁾所谓归于“政道”，则点出了刘氏父子的文献整

*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研究生

1) 《汉书》卷36《楚元王传赞》，中华书局1962年，第1972-1973页。

2) 《汉书》卷100下《叙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4244页。

3) 汉) 荀悦：《汉纪》卷25《孝成皇帝纪》，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中华书局2002年，第437-438页。

理工作在“割截横拓”之外，还有着自觉的价值追求，对接着汉代治道的现实应用。由此来看，刘氏父子的工作所要追求的，就不仅仅是文献的整理，更是要统一内学与外学，建立起“内外相应”的汉代新王官学。

2. 《七略》归于治道的价值追求

刘氏父子校书持续二十余年，从其动机与性质上来看，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文献整理工作。一方面与成帝本人的动机有着密切关系，整个校书工作要为帝王负责，并牵连当时之政治情势。⁵⁾另一方面，刘氏父子在校书整理过程中，又彰显着归于治道的价值追求，在文献工作中寄予了其文化使命。

校书人员为每部书所写定的书序，在学术意义上，为后世了解本书在当时的流传以及整理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但我们更应该首先承认，刘氏父子所整理出的书序，本质上是因职责所系而向皇帝所上的工作汇报。《汉书·艺文志》言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梁阮孝绪《七录序》亦曰：“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别录》是刘向叙录的结集，包括刘歆在此基础上所成之《七略》，从今天学术分科的角度来看，都类似于目录学的书目提要。事实上，“书目提要”也是迄今解读刘氏父子书录的主要甚至是唯一视角。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刘向校书“随竟奏上”的叙录实际上是以官文书“表”的文体形式出现的。叙录首先是“群臣上书于天子”的上行文书，然后才是书目

4) (东汉)王充：《论衡》卷29《对作篇》，(清)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177页。

5) 邓骏捷指出：“元、成二朝郊庙礼制改革的论争，以及成帝朝灾异屡降，迫使成帝急需理论的依据和历史的借鉴，加之成帝个人对典籍经书的喜爱，便效法前朝以求书、校书来寻求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传统，这才是成帝下诏校书的真正的动机。刘向适逢其时，以其特殊的身份承担了历史交托给他的重大使命。”邓骏捷：《刘向校书动机发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5期。

提要，“叙录的内容具有资于治用的外围指向以及引经据典的论述方式，这是与单纯书目提要的重要差异之处”。⁶⁾ 今存刘歆《山海经叙录》，诸家辑本皆题为《上〈山海经〉表》，即可为证。

在现存叙录文字中，也明显透露着其对君王负责的消息。如《战国策叙录》中言：“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管子叙录》中言：“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晏子叙录》中言：“其《内篇》六篇可常置旁御观。”《孙卿叙录》中言：“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此中“皆可观”“可常置旁御观”云云，纯为对君王上奏之言；“福国安民”“可以晓合经义”“可以为法”云云，也是指向政治之用，都是向君王陈奏的言语。从“录而奏之”的意义上说，刘向叙录乃是纯粹的官府行政文书，所谓“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⁷⁾因而具有关乎政权运作和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刘氏父子归于治道的用心，不但明显体现在为每部书所写的书序中，也同时体现在次序诸种典籍的目录设定中。刘氏父子的文献整理工作，尊重了西汉中前期实际收藏整理工作中形成的文献层次，即自司马氏掌太史藏书后所形成的“六经异传、百家杂语”这一文献序列。刘氏父子按照这一文献序列对西汉藏书进行了学术性架构，为建构汉代“新王官学”谱系做出了努力。

在刘氏父子的观念中，六艺经典为先王成法，是不能分割的一个文献整体。班固《六艺略》曰：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⁸⁾

六艺之文被视为一体，决不可支离分解，它们之间形成紧密关联，有着先验的内部逻辑，班固此种观念应是承继刘氏父子而来的。从文献来源上讲，汉代中

6) 参见傅荣贤：《作为上行文书的刘向叙录》，《山东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6期。

7) (南朝·梁)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5《章表》，中华书局2006年，第302页。

8) 《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3页。

秘书既有当代新收集积累的，也有一部分则是继承秦朝内府藏书所来，⁹⁾其天然的就有着王官之学的基因。西汉中书所收藏的古文经书，是大一统王朝文化事业的重要一环，通过刘氏父子的整理工作，成为新王朝王官之学的根本。虽然容有博士掌习，以及零散个人拥有，但六艺经典纯粹要以中书古文为基准，并以之来判断当代其他传习本的优劣。如对于《易》的版本，宣、元之时有所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民间则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以为官方博士所传《易》文字与中书古文本存在差异，反倒是民间所传的费氏《易》更为近似。虽有打压外府博士之嫌，这也正是刘氏父子通过内府藏书的客观实际，确立并强化了“中古文”的权威地位。

百家之学也被处理为古王官学之支脉，诸子书成为六艺经典的流裔。刘氏父子所校理诸子书，也一以中书本为标准，遵循着与六经文献相同的逻辑，强化着中书的权威性。《诸子略》曰：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¹⁰⁾

正是将诸子视为虽相异而实皆相反相成的平等者，刘氏父子虽然处于儒家独尊的时代氛围下，他们依然将儒家视为诸子之一。更未因当时已有将孔子神化的苗头，就对其进行拔高，也仅仅将孔子视为“宗师”而已，这都是与时代文化氛围相背的。这种理性求实的学术态度，不但是因尊重文献工作实际而来的，更是要藉此对西汉文化体系再做一番整理，透露出一种自觉而又积极的创造精神。

刘氏父子的这一番努力，被认为是继武帝年间确立起大一统文化体系之后，对前此的文化整合的再整合。¹¹⁾而在钱穆看来，刘氏父子所确立的文献分类，

9) 参见傅荣贤、李满花、陈清惠：《试论秦王朝的官府藏书》，《山东图书馆学刊》，2013年第1期；傅荣贤：《出土简帛与中国早期藏书研究》第四章《秦朝的藏书》，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徐建委《中古文〈尚书〉与秦府图籍、〈七略〉关系蠡测》，《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0) 《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6页。

11) 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主编：《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81页。

遵循的本就是古王官学旧有的逻辑。其言：

《汉书·艺文志》以《六艺略》与诸子分类，六艺即古学，其先掌于史官；诸子则今学，所谓“家人言”是也。战国博士立官源本儒术，故《汉志》儒家固俨然为九流百家之冠冕，列诸子不列六艺，则明属家言，非官学矣。《诗》《书》为六艺统宗，虽于古属之王官，然自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诗》《书》亦已传播于民间，故儒、墨皆道《诗》《书》，于是《诗》《书》遂不为王官所专有，然百家之言亦不以《诗》《书》为限。此即在儒术而已然矣。此古者官学与典籍之大体，必明于此，而后可以明了秦廷焚书之真相也。¹²⁾

虽有文献职掌制度之变迁，如六艺古学先掌于史官，汉代则逐渐转移为内府中书职掌；有学派地位之时代升降，如儒家明属家言，但在汉代毕竟拔擢于诸子之上；有学术传习之扩展，如《诗》《书》之流衍于民间。但在钱穆看来，王官之学的大概轮廓并未因此就模糊不清，刘氏父子的文献整理也还是在此轮廓之中展开的。可以说，刘氏父子是循着古王官学的已有逻辑，以内府藏书为基础对汉代典籍重新发掘整理，进行了文化的再整合工作。

3. 影响新王官学建构的时代动因

刘氏父子以校书工作为基础来建构本朝学术体系，并以上接先秦学术传统。汉初时人对于先秦文献的分类，诸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之属，已经是以后世之眼光对于先秦史实进行过滤性的看待。诸如战国诸子对于先秦文献的保存与传授事实，当时王官学权威重新确立过程中制度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汉时人对于“王官之学”的想象等，都成为影响刘氏父子建构汉代新王官学的时代动因。

第一，战国诸子对于先秦文献的保存与传授事实对于汉人文献观念施加了重要影响。

12) 钱穆：《两汉今古文经学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7页。

周纲解纽之后，王学下行，典籍散乱，庄子发为“道术为天下裂”之说。《天下》篇中指出当时诸子纷纷言道，自以为达于大道，然而言人人殊，犹如耳目口鼻之各不相通。汉代司马谈、刘向之属居于诸子百家之下流，整理诸家之学说典籍，“因人”而隶其学，是不得不然之势，但已经无形中坠入即“器”言“器”的境地。这也是为何在诸子百家内部，要将其传习之先王经典进行化约处理；也是为何汉代学者对于六艺经典之“大义”要特为着重总结并提取，并要建构起诸子各家之间的联系，这都是为了减弱即“器”言“器”的影响。

其实，诸子本皆是民间新兴知识阶层，身份为“民”，与王官之高高在上在身份地位上有着迥异的差别，所以后人言“诸子出于王官”就很容易产生歧义，难免遭人非议。但我们应将作为社会身份的“诸子”与作为学术的“诸子之学”区分开来。诸子之学源于王官之学，这不能算错。¹³⁾以出身来论，诸子们的身份虽非贵族出身，但其坚守于道，是王官之学的忠实传承者。而汉人之所以坚持“诸子出于王官”，并在文献整理工作中要将诸子百家之学处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正是因为战国诸子在对先王之学的坚守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以儒家学派为例，孔子周游列国，困于匡地，其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正是以先王之学传承人自居的。在他的弟子中，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闵子骞“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其他弟子隐而不见者，如“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都慨然以道自任，成为先王斯文的守护者。其他诸子亦莫不如是，正是有对于“道”的坚守，先秦诸子才能够在乱世中保守住了文化典籍的传承，以待后来者的整合。

先秦诸子服膺于先王之学以求“道”的这种精神，以及由此对于先王典籍讽诵传习的功绩，得到了秦汉时人的体认与推崇。如《吕氏春秋·博志》篇谓：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

13) 参见晁福林：《诸子·王官·学统：诸子起源再认识》，《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

之……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¹⁴⁾

《淮南子》中亦记载汉儒言曰：“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¹⁵⁾ 战国诸子对于先秦文献的传习，虽然是一种分散、独立、自发的民间行为，但他们却又依靠学派内部师徒相传的形式，保证了文献传承的有效性。诸家在文献传习过程中，往往与整理、删述融为一体，他们的工作客观上为汉以后的文献分类提供了典籍依据，他们所保存的是一种经由战国诸子目光选择的历史文化传统。¹⁶⁾ 而文献典籍作为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其所蕴含的诸子之成绩与眼光，在汉人进行文化再整合、再创造的过程中已经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影响，成为不可或缺的因素。

第二，刘氏父子所建立的新王官学之制度环境，也是在更迭变化之中的。

秦汉之际，王官学由收纳统管民间学而来，这是一统王朝在知识领域确立支配权威的需要。秦兴之后，发展的是收纳百家于博士官的措施。在王纲解纽、官学下移的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各诸侯国利用并提倡新学问，以致有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此后一统之势既成，则学问发展也趋向于新的整合，当时凡有天下之志的大国，都以招揽学士贤才、笼络百家为务。较著名者如齐置稷下学宫，允许士人“不治而议论”，¹⁷⁾“不任职而论国事”，¹⁸⁾一时成为百家荟萃之中心；秦相吕不韦汇集才辨之士，以著述形式来兼儒墨、合名法，整合当代学问。其中相同的取向，都是要将民间百家之学重新收归官府，以作维护统治之用。秦兴之后则发展了纳百家于博士官的措施，以建立新的学官系统。故而钱穆言：“大抵先秦学官有二：一曰史官，一曰博士官。”¹⁹⁾ 周制下旧王官学统管于“太史”，而秦代一统之后，建立的新王官学之统管在“博士”。秦朝所发展的博士制度，其意义正是知

14)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26-1628页。

15)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303页。

16) 参见陈桐生：《论战国诸子对先秦文献的保存》，《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7) 《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1895页。

18) (西汉) 桓宽撰集，王利器校注：《盐铁论》卷2《论儒》，中华书局1992年，第149页。

19) 钱穆：《两汉今古文经学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6-187页。

识分子官僚化、百家争鸣的结束和儒生干政的开创。²⁰⁾ 凡立于秦始皇朝廷之上的博士们，都是笼络新兴学术形态而来，这是秦朝自觉建构新王官学的措施。

汉兴之后，制度未备，则又走回先秦史官文化的旧路。其中尤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太史一职自西汉初年至于武帝元朔年间的地位升降。西汉初年制度未备，尚承继先秦史官文化的余绪，以太史为掌管文献的重要职官，但随着汉制的完善，太史掌书职能逐渐消减，并渐次转移到御史、尚书，乃至郎官等新的内侍群体身上，其身份也转为纯粹之天官。而这一转变，正是因为武帝元朔年间对于中央权力结构进行新的划分，中外朝之分愈加明晰，文书职掌权归御史、尚书、郎官等皇帝亲信侍从，太史作为外朝低微之官，自然消解了掌书职能。

博士制度是由秦制而来，史官文化则是周制文明的特征，建立在这两种制度基础上的西汉新王官学，有着先天的不足。西汉前期董仲舒、司马迁等，已经从新王朝学术建设的角度对当代制度作出考察。董仲舒所提“改制更化”云云，虽然鼓动了汉武帝把袭自秦朝的百家博士予以废除，改立《五经》博士以建立汉朝的新王官学，其在内容上罢黜百家，同时专尊《六艺》，算是复兴了古王官学的正统。但从制度史的角度，还是没有跳出秦廷博士制度的大框架。司马氏父子更因累世为史官，抱定了王朝守藏史的神圣文化使命，更兼西汉前期文献收集工作确有一段时期属太史职掌，所以其考虑新王官学的出发点，也都是在先秦史官制度框架内。随着汉代君主权力空前的集中与强大，新的中央权力结构产生了，诸如博士、太史等职，将要被逐渐边缘化，让位于新的中书系统。

刘氏父子之时，则跳出了史官文化、博士制度等藩篱，在西汉王朝新的权力结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再创造的工作。内外朝分立的权力结构，与藏书的内外两分格局若合符契。在其文献序列中，中书文献成为绝对的权威，不管是博士所掌，还是太常、太史、大臣等所有的文献，都要与中书本进行比较，方能定其优劣。而数术、方技等原由史官专掌者，因“史官之废久矣”的制度变迁，亦被纳入中书秘藏。透过《汉志》的文献体系，我们看到的恰是刘氏父子为西汉王朝所建立的新王官之学的图景。《别录》《七略》，意图建构的是一套阐述一切文化资源

20) 参见方麟：《秦汉博士制度初探》，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的理论框架，是一套适用于大一统帝国新王官学的学理，这远不是史官制度与博士制度所能支撑的。

4. 刘氏父子校书与新王官学术体系的定型

刘向歆父子通过对于先秦王官学学理体系的追述建构，并吸纳宗周王官的制度框架，又结合西汉王朝新的权力结构，以汉朝内府藏书整理为中心，建构起一套完整的道术体系。《别录》《七略》不仅仅是书录、书目提要，其还是因校书职务而产生的上奏文书，是经过整合之后的西汉王朝文献体系，还是经过再创造而定型的学派谱系、知识系统。

第一，刘向歆父子的工作整合了先秦学术体系，为西汉王官学的确立做了溯源的工作。我们借由《别录》《七略》以及《汉志》，可以对西汉学术之概貌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探索。

西汉二百余年大收篇籍，到成帝之后由刘向、刘歆父子领校皇室藏书，使得累积之秘藏得到整理。班固继承刘氏父子之《别录》《七略》，撰为《汉书·艺文志》。后世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论《汉志》之贡献，认为凭此可考辩先秦学术之大道本源，探究百家诸子学问之流行演变，如章学诚言：“《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²¹⁾姚振宗言：“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渊源，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无由津逮焉。”²²⁾中国古典文献学及思想史中的一些命题，诸如“诸子出于王官”“经史同源”“经子一体”“诸子出于儒家”等，往往都是据《汉志》以“考镜源流”而得出的种种义例。我们要回到历史场景中，肯定《汉书·艺文志》首先是西汉藏书之目录，其对文献典籍的记载依据首在部帙分类，可据以言汉时人之文献

21)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六艺》，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4页。

22) (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录》，收录于《快阁师石山房丛书》，浙江省立图书馆铅印本。

观念，也可再深入探究其能彰显之学术内涵，但毕竟不能视其为纯粹的学术分类目录，为求所谓义例而不惜附会穿凿。如章学诚依托《汉志》“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论“诸子出于王官”：

其云盖出古者某官之掌，盖之为言，犹疑辞也。欲人深思，而旷然自得于官师掌故之原也。²³⁾

刘歆之言“盖”，疑则疑也，疑在对“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论的存疑不定，而并不是章学诚所言的欲人深思的“旷然自得于官师掌故之原”。恰恰相反，刘氏父子未必就掌握了官师掌故之原，且其意也不在此。好古以求者，关键在实事求是，不能以曲解古人之意而立一家之言，“求之过深，责之过苛，亦未达古人之意也”。²⁴⁾

典籍分类与知识系统分类是密切相关的，典籍分类的演变往往是知识观念与知识系统演变的体现。但我们却不能就将典籍分类等同于知识系统分类。我们难以凭《七略》《汉志》去推想复原所谓的“周秦学术之渊源，古昔典籍之纲纪”。李振宏曾经指出，“先秦诸子的划分形成于汉代；汉人根据他的时代需要，对先秦诸子学进行新阐释或改造”，并且用“‘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的说法予以概括。²⁵⁾所谓“新阐释或改造”，毕竟不是先秦学术形态的本来面目，故而李振宏所言的“汉代生成”，指出了汉人改造的主动性。最为明显的是，刘向父子对于文献的整理采取的是以人类书的方法。“以人类书”是典籍分类的一种技术性处理，并不意味着之前就存在这样一套整饬的学派谱系，这一套整饬的体系正是“汉代生成”的产物。

刘氏父子校书工作的同时，汲汲以建构汉朝之新王官学为旨归，尊崇周代王官之六经，整理先秦诸子之学术，增列汉代时人撰述，其中当然有着一贯的逻辑。先秦百家诸子，虽为自由活泼之新学问，然其精神血脉依然是相沿周制经典

23)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650页。

24)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41页。

25) 参见李振宏：《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文化而来。而汉兴诸子时人之撰述，其旨归又何尝不是以明道穷理为目的，也即太史公所标举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七略》《汉志》等材料，使得我们能在文化血脉上探寻到汉代时人与先秦学术的契合点，这已足够了。我们将《汉志》视为西汉藏书之部帙分类目录，据以考察西汉文献工作之史实，从文献工作的角度揭示出若干西汉学术观念之大致轮廓，考的是西汉文献工作之源、流，辨的是西汉学术之概貌，庶几也可称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第二，刘氏父子的工作前后相继，虽然在性质上容有差别。但这种差别是一种发展性的，刘歆正是在乃父工作的基础上，对于西汉学术谱系的定型，作了最后的工作。

对于刘氏父子思想旨趣的差异，论者多有注意，如有研究者就曾指出，“九流十家”的学派框架，关涉到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工作具体细节之差异，或不是刘向的本意。²⁶⁾大要言之，刘向较多的从思想层面对文献进行归类，重其学说旨趣；刘歆则注重建构学派系统，或可言重于形式建设。《汉书·董仲舒传》赞语曾言：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²⁷⁾

赞语中，先举刘向之赞扬，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并以之比于伊吕管晏，肯定其政治哲学向善积极的一面。而后引刘歆之语，其虽然肯定了董仲舒为“群儒首”的地位，但又梳理儒学传绪，将注意点放在“考其师友渊源所渐”上，从而指出董仲舒之学上不及于子游、子夏，更遑论得颜渊、孔子之真传。由此，认为乃父“管、晏弗及，伊、吕不加”的评价实为过誉。刘歆之评判视角，完全在于“师友渊源”的

26) 李锐：《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5页。

27) 《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6页。

学派传承上，与刘向大异其趣。

在文献整理工作中，辨明其学说旨趣并为之归类是初步工作，在文献之间辨明传习线索并为之次序则要更为繁难。诸家学派之间，容有“言公”的部分，而“私意”才是学派个性所在。要对前代文献典籍分类，一般采用“类同举例”来划定派别，考验的往往就是整理者对于公言、私意的辨定能力，有时就难免偏于主观。班固在刘氏父子之后作《汉志》，尚且有“出”有“入”者，刘歆承继乃父之后，要对各文献之“私意”进行辨明并排定其学派师承渊源，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刘氏父子对内府藏书的整理过程中，多要借助于对博士学官、私家学派等书籍的参考。可以想见的是，他们所要参考的不仅仅是文字之异同、句读之断定，更是要参考诸家之师承渊源与师说传习情况，以判定内府所藏文献的分类统属。毕竟，在汉代经学传授中，师承渊源和师说正是能否立于博士的关键。刘氏父子的工作前后相继，而刘歆的学派系统建构，是一定要建立在乃父对于先秦诸典籍思想旨趣的理清基础之上的。所以说，他们之间所显露的差异，从另一方面来看，则毋宁视作为校书工作的一种必然结果。

第三，我们通过对于《移书让太常博士》的再评价，来看刘氏父子汲汲以求的，就是要建构起一套能够统一内学、外学的新王官学。

一般而言，对于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都以为是刘歆愤激之语。看待这一问题的时候，若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之“今、古文经”相争的视角，重新体悟其中微言，则能揭示当时内外学术之变化消息。刘歆为《左传》、逸《礼》、古文《尚书》争立官学，其所凭借的，正是中书之秘藏。观其言曰：

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内外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²⁸⁾

在这其中，“内外相应”之语值得重视。我们认为，这句话透露出的，正是刘歆欲以天子之学对于外廷之学的重新争取。

28) 《汉书》卷36《刘歆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6页。

在西汉中前期，太史藏书职能的弱化，博士藏书的专门化，诸侯藏书汇集中央，确立了中央内府藏书的权威性。内府藏书，“五家之儒莫得而见”，外府士人难以窥知内府秘藏的文献典籍。中央政府以建构新王官学为鹄的，随着儒家学说占据王朝学术的主流意识形态，经学自然成为新王官学的核心。而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源于对先秦文献继承的现实，在经学发展过程中其内部又产生了异样之分途。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歧渐成为汉代学术发展内部之裂痕。为了巩固新王官学的基础，中央政府一定要对经学内部的分歧进行弥合，并可能利用此种分歧而对于学术发展进行控制，以确立王权之权威性。内书所藏，本即以古文旧书为主体，在新王官学确立的过程中，文献整理工作的进行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同时日益明晰了古文原典对于新王官学的重要性，特别是要凭此以确立“内学”的关键作用。

成帝喜好古文旧书，诏令刘向等校中秘书，方才使得西汉历年所藏文献得到完全的整理。刘歆以中秘所藏古文旧书，质疑外府博士学官所传授典籍，为的是取得内外相应的大义。从学术发展上来讲，这也是一种必然之趋势。奈何经学博士们已经凭借家法、师法之传授而形成固定的利禄利益，以私心而害公义，难怪刘歆要对此愤恨。然而平心而论，博士们传经而形成家法、师法之严密分界，又正是因为内外文献两分却又难以相应的弊端造成的。中书秘藏而不校理，外府所藏皆为断简残编，儒生们必然要抱残守缺，并多为训诂，无怪乎其对于中秘所藏产生抵触。虽然在宣帝时，对于今文经学诸家，已经众立为博士，采取一种兼容并蓄之法。并以石渠阁经学会议的方式，树立制定学术标准的权威。至于成帝时，外廷之学术因所立博士众多，利禄之途大开，还是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刘歆以中秘古文，与外廷博士等今文经义相比较，认为中秘古文不能废止，并用孔子“礼失求诸野”为说，要求遵循宣帝时对于今文诸家并置博士之成例。在此情况下，其所言的中秘古文旧书“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内外相应，岂苟而已哉”，直接抬出天子而造势，并不惜言“内外相应”而向外廷诸家示好。奈何外廷之学势力雄厚，他只能做争取的努力，“内外相应”的示好之辞，透露的只能是一种无奈。但总而言之，刘歆所争者并不在所谓的“古文

经”，而是要借此树立起内府藏书的权威，并进一步获得对于学术解释权的掌控，从而完成汉朝新王官学的最终建构。

< 参考文献 >

- (西汉)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东汉)班固撰，颜师古注.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张金吾. 两汉五经博士考[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王葆玟. 今古文经学新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葛志毅. 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 龚鹏程. 汉代思潮[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顾颉刚. 汉代学术史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曹胜高. 秦汉文学格局之形成[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Abstract >

The Collating Literature Work of Liu Xiang and Liu Xi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Xin Wang Guan Xue'

Geng, Zhan-chao

The literature arrangement of Liu Xiang and his son Liu Xin was meaningful for integrating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documents of the pre-Qin period, and it also had more conscious value pursuit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Han Dynasty. The work of Liu Xiang and Liu Xin wa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integration of the academic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distinction

pattern of collecting books in and out of Western Han's palace. Therefore, its objective was to set up the authority of collecting literature in palace, furthermore, to control over the right of the academic interpretation and unify the academic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alace, so as to establish 'xin wang guan xue' of the Han Dynasty palace that was 'the academic inside the palace coordinating with the outside'.

Key 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Liu Xiang; Collating Books; *xin wang guan xu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imperial academic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7. 10. 30.	2017. 11. 28.	2017. 12. 13.	2017. 12. 16.	2017. 12. 31.

